

譯者序

本書的俄文名稱是 *Синьцзян в орбита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Сталин 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Восточном Туркестане (1931–1949)*。其中 *орбите* 這個詞有兩個意思，一是天體在引力作用下運行的軌道；二是影響、作用的範圍。因此，如果直譯，書名的主標題可以譯作「蘇聯政策軌道上的新疆」或「蘇聯政策範圍內的新疆」。幾經斟酌，採用了現在的譯名，或不失原意，作為書名也簡捷一些。

本書論述蘇聯與新疆關係的時間是 1931 至 1949 年，這 19 年是民國時期蘇聯—新疆關係（以下簡稱蘇新關係）最重要、最複雜且存疑最多的時期，而民國時期的蘇新關係，又是其時中蘇關係中極特殊的領域。譯者認為，民國時期的中蘇關係是中國近代以來對外關係史中最複雜的，表現出多主體、多層次的特點。第一個層次是蘇聯政府對中國政府的關係。1924 年 5 月，蘇聯與北洋政府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此關係後被南京國民政府繼承。第二個層次是蘇聯政府與中國地方政權的關係，這種關係突出表現在東北和新疆（及廣州革命政府治下的廣東，時間很短）；第三個層次是蘇聯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整體而言，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其對華政策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內容，但是更核心的是蘇聯的國家利益。這既是這一時期中蘇關係的主要背景，也是蘇聯制定和實施新疆政策的基本出發點。

上述時段中，影響最大、不明問題和爭議最多者，無疑是 1944

年至1949年期間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及其與蘇聯的關係，這也是本書篇幅最多、最重要的一章第四章，最需關注的原因。這裏簡單介紹一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1944年11月7日，新疆伊寧發生了多民族參與的武裝暴動，參與者與入境作戰的蘇聯紅軍一起迅速控制了伊寧市區，清除了政府機構及軍隊、警察，11月12日宣佈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1945年1月5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發布宣言稱，「中國對東突厥斯坦領土的佔領已經被清除，……已建成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證明，自己是自由、獨立的國家。」顯然，這是一個明顯具有分裂目的的政權。1945年4月，該政權的武裝力量民族軍正式成立，之後於5月開始向阿勒泰—塔城（北線）、烏魯木齊（中線）、阿克蘇（南線）三個方向進行軍事攻擊，即三線攻勢。民族軍很快攻取了主要為伊寧、塔城、阿勒泰三個專區的廣大地區。其中，中線部隊達到瑪納斯河西岸，離烏魯木齊不遠了。這期間，考慮到對日作戰和戰後國際局勢以及中蘇關係，蘇聯與中華民國政府於1945年8月1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一個月後的9月15日，蘇聯駐華大使彼得洛夫向南京政府遞交了備忘錄，稱應伊寧起義民眾的請求，蘇聯願意在起義者與新疆政府之間充當調解人，停止雙方的武裝衝突，這表明蘇聯改變了其新疆政策。此後，民族軍逐漸停止了對政府軍隊的進攻。在蘇聯駐新領事館的直接參與下，1946年1月2日「三區」代表與新疆政府簽訂和平條款及附文，7月1日新疆聯合政府成立。1947年8月，聯合政府破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作出幾個決定，向三區政府提供大量武器裝備，並派出紅軍進入阿勒泰專區作戰。由於解放戰場的迅速變化，1949年8月14日，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共代表鄧力群由莫斯科抵伊寧，與三區政權建立聯繫。1949年9月下旬，國民黨新疆軍政當局領導人通電起義，新疆和平解放，民族軍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軍，三區政權機構也作了相應的改造。這一段歷史，之後被稱為「三區革命」，但這一名稱的來歷至今尚不清楚。

對於上述歷史，特別是有關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各種情

況，境內外學者及有關人士進行了許多研究，出版了不少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張大軍的《新疆風暴七十年》、¹拉鐵摩爾 (Owen Lattimore) 的《亞洲的樞紐：新疆與中國和俄羅斯的內亞邊疆》、²艾倫·惠廷 (Allen S. Whiting) 和盛世才的《新疆：籌碼還是樞紐？》、³安德魯·福比斯 (Andrew D. W. Forbes) 的《中國中亞的軍閥和穆斯林：1911–1949年民國新疆政治史》、⁴楊邊琳 (Linda Benson) 的《伊犁叛亂：1944–1949年穆斯林對中國新疆主權的挑戰》、⁵王柯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⁶王大剛 (David D. Wang) 的《蘇聯庇護下的伊寧事變：1944–1949年新疆的民族衝突與國際競爭》、⁷米華健 (James A. Millward) 的《歐亞十字路口：新疆的歷史》等，⁸這些文獻在本書中多被引用。⁹上述成果和資料涉及到「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各方面，其中蘇聯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關係的研究佔了相當比例。除了學術性成果，還有一些回憶錄、報道、口述史等資料，程度不同地介紹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但是，這些論述使用的資料，都缺少蘇聯官方文件，不少結論性的重要意見都出於推測，留下了許多爭議和疑問，最重要者，是對「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性質和蘇聯在其中作用的看法。這些看法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認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是新疆穆斯林民眾發動的民族解放運動，蘇聯雖然參與了，但不是主導因素，可以楊邊琳為代表；另一種則認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之所以出現，完全是蘇聯對新疆政策的結果，可以王大剛為代表（他還認為，「三區革命」不屬於民主革命的範圍）。造成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是聯共（布）中央當時採取了極為嚴格的保密措施和掩護手段，這使得國民政府、新疆政府都不甚了解蘇聯在「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中的真實作用，更不知道聯共（布）中央的決策。由於對中共也嚴格保密，所以中共也不知道蘇聯在新疆幹了什麼，甚至到1949年1月至2月米高揚在西柏坡與毛澤東會談時，也斷然否定蘇聯參與了伊寧暴動。聯共（布）的保密工作使得當時及之後的很長時間，沒有人了解聯共（布）中央

決策的內幕，直至蘇聯解體後開放了部分檔案，由此，自然不難理解學術界存在不同意見了。對歷史事實了解不足，造成看法之間的分歧是常見的事。在此順便提一點：葉利欽總統時期開放的檔案，許多後來又關閉了。在本書交稿時，譯者看到了日本學者寺山恭輔寫的《斯大林與新疆：1931–1949》一書（社會評論社，2015年），該書在敘述時段上與本書相同，研究重點在盛世才主政新疆時期蘇聯與新疆的政治和經濟關係。作者使用了許多相關俄文文獻，包括一些檔案資料。寺山曾去過俄羅斯的有關檔案館，希望能查閱「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等問題的檔案但未果。因此，他認為目前對蘇聯在盛世才時期對新疆的軍事參與以及「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等問題還不能做詳細研究。雖然如此，寺山的書對盛世才時期蘇新關係特別是1930年代日本對新疆關注的研究，還是很有價值的。

近20年來，獨聯體國家、主要是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的學者使用解密的蘇聯官方檔案，對上述研究作了重要補充。其中，巴爾明的《1941–1949年蘇中關係中的新疆》可被視為使用蘇聯檔案論述「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第一部著作。¹⁰ 作者用檔案材料揭示了諸多以前不為人知的重要史實，由此他認為蘇聯在「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不認為蘇聯要吞併新疆或使新疆獨立（幾位俄羅斯學者持此觀點）。之後，克拉西里尼科夫的專著《新疆的誘惑：俄羅斯在中國西北——被遺忘的歷史（1850–1950）》也以解密的蘇聯檔案為主要文獻，¹¹ 論述了蘇聯在新疆的活動，而且他引用了多份聯共（布）中央關於新疆的決議。他認為，聯共（布）中央在組織起義中發揮了領導作用，同時向起義者提供了物資和軍事技術援助。而且，莫斯科的影響左右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政府；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組建特別任務處以負責相關行動，就足以說明一切。2015年5月，由賈米里·哈桑雷（Джамиль Гасанлы）撰寫的本書在莫斯科出版。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書引用的蘇聯檔案文獻超過百份，明顯超過了其他同類著作，僅引用的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關

於新疆的決議就有45個。作者詳細論證了蘇聯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關係，明確指出這是一個分裂政權，是蘇聯維護自己在新疆利益的工具。本書披露的聯共(布)中央政治局1943年5月4日關於新疆的決定實質上是全面干預新疆的綱領，包括了領導、宣傳、組織等各方面的工作。同時，他認為蘇聯對新疆的干預是二戰後期及戰後蘇聯對南部周邊政策的一部分，與蘇聯當時對土耳其和伊朗的干涉都是同一政策的組成部分。哈桑雷的觀點很值得關注。在本書之前，他已出版了《蘇聯與伊朗：阿塞拜疆危機與冷戰的開端(1941-1946)》、《蘇聯與土耳其：從中立到冷戰(1939-1953)》等書，¹²構成一個系列，提出了冷戰是由蘇聯挑起並從東方開始，而不是西方挑起從歐洲開始的觀點(在本書中亦有論述)。本書引用了大量蘇聯檔案，尤其是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關於新疆的決定，對「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性質和它與蘇聯的關係作出了頗有說服力的結論，同時對新疆局勢與冷戰的關係提出了新穎的看法，無疑是其獨特的學術貢獻。除此以外，本書還引用了1947年2月和1947年9月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再次向「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提供大批武器裝備等重要檔案和史料，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貴的資料。本書之外，哈薩克斯坦學者奧布霍夫連續出版了《六個帝國的交鋒——爭奪新疆之戰》、《貝利亞的鈾》等六本專著，¹³其中有很多內容涉及到「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各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蘇聯干預新疆、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原因是為了開採塔城等地的鈾，以保證蘇聯當時正加緊進行的原子彈計劃。奧布霍夫的這一觀點與其他學者明顯不同，他的書中資料不僅豐富，而且具體。遺憾的是，所用資料都沒有注明來源。另一位哈薩克斯坦學者西羅葉日金在其著作《中國民族分裂主義的神話和現實與中亞安全》中，¹⁴以相當篇幅敘述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與蘇聯的關係。他的看法是：「沒有蘇聯方面的積極支持，『三區革命』根本就不會發生。……每一次，當起義者無力前行時，紅軍部隊都會越過邊界前來，幹完事情後就撤走。」此外，還有多位俄羅斯

學者的著作以大量文字論述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有關情況，如《亞洲動盪的「心臟」：新疆——民族運動簡史與回憶》等。¹⁵著作之外，還有不少論文論述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及相關問題，篇幅所限，在此就不作介紹了。總之，獨聯體國家學者對蘇聯與新疆的關係做了許多研究，一方面，他們大都認為聯共（布）主導了新疆的局勢，另一方面，也指出政府的低效統治和社會—民族矛盾是多次少數民族暴動的重要原因，也為蘇聯的干預提供了條件。

獨聯體國家學者的研究使用的大量官方檔案，特別是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有很高的史學價值和權威性，填補了不少原有研究中的空白，澄清了許多疑問，使得對「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和蘇聯與新疆的關係研究大大推進了一步。他們的研究使我們了解到新疆在蘇聯對外政策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聯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本人對新疆問題的關注達到了什麼程度。斯大林的英文翻譯別列日科夫在其回憶錄《我怎樣成為斯大林的翻譯》中寫道：¹⁶「起初我很驚奇：在外交人民委員部的文件中，新疆被劃分為一個特殊地區並由副外交人民委員傑坎諾佐夫負責（傑坎諾佐夫是格魯吉亞人，與貝利亞關係密切，曾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總局副局長，是大清洗的主要參與者之一。在貝利亞被處決後不久，也被執行死刑——譯者註）。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中國的這個省事實上是由莫斯科在管理。」別列日科夫的看法準確地描述了新疆和蘇聯的關係，或許讀者在閱讀本書後會贊同他的意見。

從本書所述可以看出，蘇聯新疆政策的目標是把新疆納入其勢力範圍。政策實施的主要特點是：培植代理人，建立親蘇組織和團體，進行經濟、文化、意識形態擴張和軍事干預。「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就是這一政策的產物。學術界常以「雙重原則」來評述蘇聯的對外政策，即一方面遵循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支持世界各國民眾反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乃至直接輸出革命；另一方面又以國家利益為主導，拋開國際主義和意識形態。筆者認為，在蘇俄（聯）政權建立

初期，其對外政策較多地考慮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後期，轉變為以國家利益為核心，這在其對華、對新疆的政策中表現得非常明顯。蘇聯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不僅違背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甚至連起碼的國際關係準則都不顧及，在反法西斯同盟國內製造了一個代理人政權！正因為如此，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對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一事嚴格保密，並極力否認自己的參與。

以上對本書的學術價值及相關研究信息作了簡要介紹。相信讀者在了解這些內容後，會豐富對其他一些重要史實的認識和理解，例如蔣介石在1945年中蘇兩國就同盟條約一事談判時，幾經努力無果，最後在斯大林的壓力下，不得不同意在外蒙古進行獨立公投以換取蘇聯停止干預新疆，即一般所說「蒙古換新疆」，本書為此作出有分量的解釋；再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計劃，對如此重要的事情，中共竟然毫不知情，這為準確定位當時的兩黨關係提供了參考；更具現實意義的是，多年來，新疆分裂主義的多個組織都在宣傳繼承「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革命傳統」，本書的論述表明，「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並不是一次自主的民族解放運動，而是蘇聯實現自身利益的工具。俄羅斯學者克拉西里尼科夫的總結是很有意義的，他說：「蘇聯領導人在組織『三區革命』中的主導作用是毫無疑問的。同樣的是，起義運動直接依賴於莫斯科的立場，取決於蘇聯方面幫助的程度和規模，這些對取得最終勝利發揮了主導作用。總之，新疆民眾在蘇聯領導進行的一場與中國的政治大博弈中，只是一張可以用來交換的牌。」

本書基於蘇聯官方檔案（也使用了一些美國檔案）、特別是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關於新疆的決定，對上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蘇聯與新疆的關係作了頗有深度的論述，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史料，澄清了不少問題，推進了該領域、尤其是對「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研究，很值得稱道。但尚有一些重要問題有待進一步發掘，如在二戰結束之際，蘇聯改變對華政策及新疆政策的思考和過程，蘇軍和情

報部門在「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中的具體活動，「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及民族軍主要領導人的真實身份及其與蘇聯的關係，蘇聯駐新疆各領事館和貿易代表處的情報活動，蘇聯在新疆勘探和開採礦產的情況，傑坎諾佐夫秘密訪問新疆的具體活動等。這些問題，關乎到中蘇關係史、中共與蘇（聯）共關係史、中共黨史、蘇聯史、民國史、新疆史等，有待今後做更多研究。

本書內容廣泛，涉及不少人名地名，特別是新疆的一些小地名，翻譯起來頗感吃力。北疆的地名不少有蒙文、維文、哈文等幾種，又有不少變動，書中所用又不明其來源，譯者找了1949年前的新疆地圖，也難以找出對應者，此類地名只好採用音譯。雖知去原地調查或許可以找到答案，但限於各種條件，無力為之，十分遺憾。另外，凡是由中文譯為俄文的，都盡量找到原文；一些人名已有多種譯法的，採用較普遍的譯法。對某些一般讀者可能不易理解的內容或原文有誤之處，做了簡單的註釋。譯者雖主觀上盡了力，對譯文作了多次修改，但難免仍有謬誤，望讀者指出。

楊恕

2021年2月

註釋

- 1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台北：蘭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
- 2 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0).
- 3 Allen S. Whiting and General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 4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Cambridge, England: CUP Archive, 1986).

- 5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0).
- 6 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
- 7 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8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9 有關上列書籍的介紹，可見吳啟訥：〈新疆現代史研究述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頁149–84；文志勇：〈我國大陸地區「三區革命」史研究概述〉，《西域研究》，2015年第3期，頁131–38；馬合木提·阿不都外力：〈新疆「三區革命」研究綜述〉，《新疆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頁131–36。
- 10 В.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гг*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БГПУ, 1999).
- 11 В. Д.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Синьцзянское притяжение: забытые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м Китае, 1850–1950* (Москва: Дипакадемия, 2007).
- 12 Д. Гасанлы, *СССР-ИРАН: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и начало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6 гг* (Москва: Герои Отечества, 2006); Д. Гасанлы, *СССР-Турция: от нейтралитета к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1939–1953* (Москва: Центр Пропаганды, 2008).
- 13 В. Г. Обухов, *Схватка шести империй: битва за Синьцзян*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07); В. Г. Обухов, *Уран для Берии: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в Атомном проекте Кремля*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10).
- 14 К. Л. Сыроежкин,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этнического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в Китае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лматы: Дайк-Пресс, 2003).
- 15 В. И. Петров, *Мятежное “сердце” Азии: Синьцзян,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народных движений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осква: Крафт+, 2003).
- 16 В. Бережков, *Как я стал переводчиком Сталина* (Москва: ДЭМ, 1992).